

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专题

中国“三大倡议”的 全球治理逻辑及实践路径 ——基于国际公共产品供给视角的分析

蔡翠红 于大皓

[摘要] 今天人类正面临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乏力带来了多重全球治理困境，扩大了复合全球治理赤字。中国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可以被统合视为新时代中国为全人类提供的优质国际公共产品。“三大倡议”密切联系、不可分割，作为一个有机整体能够突破全球治理的地缘冲突困境、发展失衡困境、体系失灵困境和价值混乱困境，进而弥合全球治理的和平赤字、发展赤字、信任赤字和价值赤字。但若真正发挥作用，中国还需要形塑学理逻辑，建构知识体系；加强国际推广，讲好中国故事；落实配套措施，持续优化细化；各界广泛参与，多元共同推动；团结世界共进，达臻全球善治，将“三大倡议”落到实处，着力塑造人类繁荣、和平、昌明的新未来。

[关键词] 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国际公共产品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13654/j.cnki.naf.2023.05.001

[文章编号] 1003-7411(2023)05-0003-(16)

[收稿日期] 2023-05-14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1&ZD168)

[作者简介] 蔡翠红，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于大皓，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上海 200433）

2023年3月1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主旨演讲中提出了“全球文明倡议”，^[1]这一倡议与习近平主席2021年9月21日在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2]2022年4月21日在博鳌亚洲论坛开幕式主旨演讲中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3]共同构成了围绕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中国“三大倡议”。“三大倡议”密切联系、不可分割，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最新成果，为实

现共同发展、维护世界和平、推动文明进步贡献了“达臻善治”的中国智慧。

当今世界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乏力,全球治理所面临的困难与挑战风高浪急。中国提出的“三大倡议”可以被统合视为新时代中国为全人类提供的优质国际公共产品,为解决全球治理紧要问题给出了安全、生产、制度和知识方案,是形塑美好世界、弥合治理赤字、实现全球善治的最大公约数。在这一背景下,从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视角出发,将“三大倡议”置于同一框架下,统合而非割裂地探讨其治理逻辑及实践路径,对于保障世界经济平稳均衡发展、消弭既有或潜在安全挑战、提高异质文明间包容互鉴、营造良好国际大环境、助力我国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至关重要。

一、公共产品供给与全球治理困境

今天人类正面临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国际社会对“金德尔伯格陷阱”(Kindleberger Trap)的担忧日甚,带来了多重全球治理困境,扩大了复合全球治理赤字。

“国际公共产品”(International Public Goods)的概念源于对国内公共产品(Public Goods)的分析。^[4]保罗·萨缪尔森(Paul A. Samuelson)指出,公共产品有两大特征,其一是消费的非排他性(nonexclusive),其二是消费的非竞争性(nonrival)。^[5]在公共经济学中,公共产品就是指消费过程中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特征的产品,这一概念后来被应用于国际关系分析,进而形成了国际公共产品理论(International Public Goods Theory)。^[6]最早将公共产品概念引入到国际关系学界的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P. Kindleberger)认为,国际体系的稳定运转需要某个国家来承担“公共成本”,霸权国的存在能提供和维系国际公共产品,使得国际体系稳定。^[7]所谓“国际公共产品”就是具有一定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而消费群分布在不同国家、原则上能使不同地区许多国家的人口乃至世界所有人口受益的产品。^[8]国际公共产品是国际生产专业化分工过程的衍生物,是专业化过程中为了协调收益、分担成本的产物。^[9]有效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重要作用在于对跨国活动中必然产生的利益冲突进行协调与解决,降低各项成本,从而维系国际社会的正常运转。^[10]

基于金德尔伯格的国际政治逻辑,^[11]2017年初约瑟夫·奈(Joseph S. Nye)正式提出,特朗普的上台给国际政治带来了新的风险,未来国际政治可能会面临“金德尔伯格陷阱”,即当美国缺失意愿为稳定世界市场提供国际公共产品,而中国又没有足够的实力主动提供国际公共产品,那么,不仅世界经济体系会因此动荡不安,甚至可能会进一步导致国际政治体系冲突不断乃至世界大战爆发。^[12]近年来,随着中美结构性权力博弈加剧,国际社会对“金德尔伯格陷阱”导致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缺失的担忧日益升温。^[13]根据霸权稳定论的逻辑,中国复兴导致了美国实力的相对下降,收益-成本关系的转化降低了美国供给全球公共产品的意愿,霸权领导力缺位带来全球体系的不稳定。^[14]在以往西方作为国际公共产品主要提供者的年代,虽然其在提供公共产品的同时也在利用这些公共产品达成基于自身利益的目的,但因为有一个权力相对集中的核心,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相对较弱,因而“集体行动难以达成”的“奥尔森困境”(Olson's Dilemma)^[15]并没有今天这么突出。然而现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面临重组,美国逐渐转向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欧洲也在不断强调自身的独立与主权,整个西方不仅经济实力

相对有所滑落,而且政治自信心也出现动摇,使其在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上的公信力和执行力都遭受重挫。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西方国家对全球治理投入资源的能力和意愿都可能会持续下降。^[16]

苏珊·斯特兰奇(Susan Strange)认为国际社会存在着安全、生产、金融和知识四种结构性权力,^[17]四种结构性权力背后其实分别代表着秩序、财富、公正和自由四种人类基本价值追求。金德尔伯格指出,国际公共产品包括以下几部分:稳定的国际货币、资本流动、贸易体系、稳定时期一致的宏观经济政策和必要时的危机管理;建立在最惠国待遇、非歧视原则和无条件互惠原则基础上的自由开放的国际贸易制度;国际安全的提供与维护。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里茨(Joseph Eugene Stiglitz)则提出,国际公共产品主要包括国际经济稳定、国际安全与和平、国际环境、国际人道主义援助。^[18]

综合既有研究、现实发展以及四种人类基本价值追求,本文将国际公共产品划分为安全、生产、制度和知识四个类别(见表1)。

表1 国际公共产品类别

类别	安全公共产品	生产公共产品	制度公共产品	知识公共产品
概念	试图在全球或地区层面上达成世界和平稳定和国家间安全状态的一种产品。	试图在全球或地区层面上达成生产力解放和世界经济繁荣状态的一种产品。	试图在全球或地区层面上达成国际合作稳定开展和各方矛盾有效调解状态的一种产品。	试图在全球或地区层面上达成文明和谐相处和价值包容互鉴状态的一种产品。
形式	安全机制、安全条约、安全协议、安全保证、安全理念等。	经济发展援助、国际金融与贸易规则、脱贫发展经验、技术标准制定等。	国际合作平台、各类国际组织、各领域相关机制、国际法等。	知识创新、人文交流机制、共享观念、价值共同体等。
价值	秩序	财富	公正	自由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其中,安全公共产品主要指试图在全球或地区层面上达成世界和平稳定和国家间安全状态的一种产品,^[19]此类公共产品以安全机制、安全条约、安全协议、安全保证、安全理念等各种形式呈现,以秩序价值为核心追求;生产公共产品主要指试图在全球或地区层面上达成生产力解放和世界经济繁荣状态的一种产品,此类公共产品以经济发展援助、国际金融与贸易规则、脱贫发展经验、技术标准制定等各种形式呈现,以财富价值为核心追求;制度公共产品主要指试图在全球或地区层面上达成国际合作稳定开展和各方矛盾有效调解状态的一种产品,此类公共产品以国际合作平台、各类国际组织、各领域相关机制、国际法等各种形式呈现,以公正价值为核心追求;知识公共产品主要指试图在全球或地区层面上达成文明和谐相处和价值包容互鉴状态的一种产品,此类公共产品以知识创新、人文交流机制、共享观念、价值共同体等各种形式呈现,以自由价值为核心追求。

四类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不足与西方权力的相对衰落及转移密切相关,加剧了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带来了当今全球治理所面临的四重困境,扩大了四维复合全球治理赤字,进

而阻碍了基本价值追求的达成(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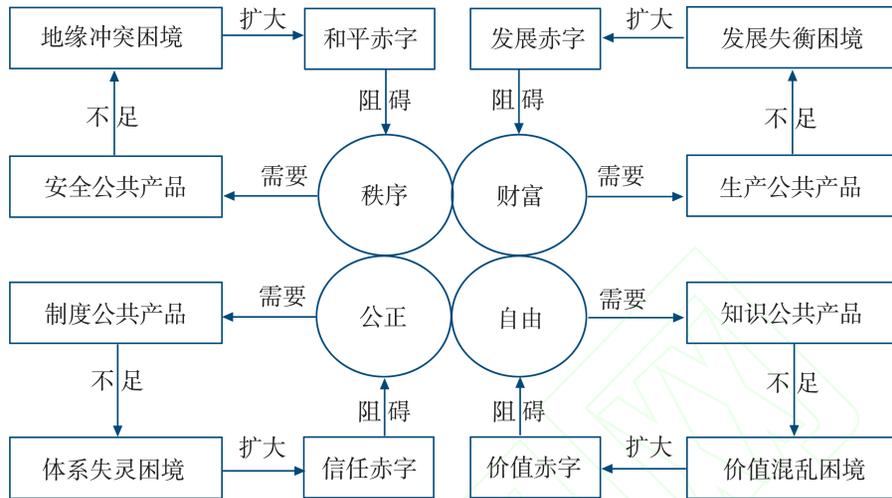


图1 国际公共产品供给视角下的全球治理困境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一)安全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带来地缘冲突困境并扩大全球和平赤字

和平是人类一切追求的“根”与“魂”，没有和平，其他都无从谈起。在一个各国命运与共的世界中，全球安全对各国都有特别的意义。^[20]“安全”作为一种状态，一般被认为是指免于遭受外部威胁、恐吓和危险；而作为一种能力，则是指在不得不面临外部威胁时，能够以合理的代价保护自身。^[21]然而，当今世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威胁交织叠加，全球安全形势极为严峻，既有冲突管理机制失灵，人类社会陷入前所未有的多重安全困境。^[22]西方传统的安全理论，无论是“均势安全”“联盟安全”还是“集体安全”，都是基于零和博弈的底层思维逻辑。随着“奥尔森困境”的放大和“金德尔伯格陷阱”忧虑的加重，西方本就根基不稳的安全公共产品供给不进反退。尤其是近年来，美国等国家不断将既有安全机制“私物化”，利用既有机制实现其自身目的，使得既有安全公共产品公信力大为受损，且没有新的安全公共产品补充，世界各国的不安全感逐渐增加，开始愈发失去互信。以俄乌冲突为代表的地缘政治冲突不仅使得安全相关领域的全球治理难以为继，其负面影响也已“外溢”到其他治理领域，扩大了本就非常严重的全球和平赤字。

(二)生产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带来发展失衡困境并扩大全球发展赤字

发展是全人类的共同愿景。^[23]然而，从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到2014年全球大宗商品降价，再到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挑起经贸摩擦，及至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逆全球化风起云涌，旧生产公共产品日渐失效，全球可持续发展不断遭受冲击。随着近来美国“印太战略”实施、大国博弈激化、意识形态对立，再加上疫情余波尚存，国际体系仍在持续变动，世界经济的稳定和繁荣愈发不容乐观，且旧有生产公共产品的机制和规则较为陈旧，难以妥善服务数字时代的国际发展。虽然目前世界正在从新冠疫情的阴霾中走出来，但全球团结发展的共识已然被大幅削弱，发展失衡成为当前世界经济的典型特征。全球发展失衡，一方面表现为国际发展态势

疲软,另一方面表现为国际发展鸿沟严重。据联合国(UN)发布的《2023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受多重危机交汇的影响,世界经济前景黯淡且存在不确定性,2023年,全球经济增速预计为1.9%,成为数十年来增速最低的年份之一。^[24]世界经济发展既缺乏效率又不够公平,出现大幅度失衡。在此背景下,大国生产公共产品的供给意愿却愈发降低,全球发展赤字明显扩大,尤其是在新冠疫情后,西方逐渐倾向于利己性自救而不是利他性救援,表明美欧无意继续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SDG)的实现。

(三)制度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带来体系失灵困境并扩大全球信任赤字

国际体系的运转仰赖于制度供应的充足,因为国际制度能够确保成员国之间利益和权力分配的公平性,以及成员国参与的广泛性。^[25]然而,任何国际制度都不可能永远契合不断变化的环境,其运行后的结果也并不是完全人为可控的。经过近年来人类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多领域生态全方位变化的冲击,冷战结束以来美国所维系的西方国际制度陷入严重的危机。伴随着一度支撑起西方国际制度运行的美国霸权相对衰落,美国的全球民主扩展战略在世界范围内处处碰壁,美国自身在其同盟体系内部的领导力也在不断下降,该制度塑造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遭到普遍的质疑,美国和西方国家所主导的各类机制越来越缺乏基本的公正、信誉和包容性。^[26]在此种情况下,以旧有西方主导的制度及其规则为基础的国际体系运转逐渐失灵,而新的制度公共产品缺位,造成国际行为体无所适从,不信任感、不安全感愈发强烈,对制度所保障的公正丧失的担忧,使得全球信任赤字不断扩大。信任是国际交往合作的重要前提,^[27]信任赤字反过来又放大了现行体系的不公正性。

(四)知识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带来价值混乱困境并扩大全球价值赤字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随着生活条件、社会关系、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28]全球各大文明及其衍生分支,由于历史与现实实践的不同,价值观必然不可能完全同质,价值观相异本不是合作难以达成的原因,因为世界上本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价值取向,但价值观不和却会导致意识形态对立,进而引发猜忌,所以人类需要能够导向“和而不同”的知识公共产品。然而,世界非但缺乏能够导向“和而不同”的知识公共产品,而且近年来在西方政客的煽动和炒作之下,国际社会各种“文明冲突”“文明优越”“白人至上”等不和谐论调沉渣泛起,狭隘的民族主义、零和博弈思维充斥在各类国际交往行为中,多重价值挑战和危机交织叠加,各种文化思潮激流涌荡,世界不知何去何从,人类共同价值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全球价值赤字持续扩大。

在四类国际公共产品供给均出现乏力的背景下,全球治理困境扩大了和平、发展、信任和价值四维复合治理赤字,世界接下来该往何处走,成为亟待思考的关键问题。

二、中国“三大倡议”的全球治理逻辑

面对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乏力和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中国从自身国家利益与实际能力出发,早已开始积极参与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与各国共同应对全球治理挑战,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促进区域互信与合作方面,充分展现了负责任大国的担当。^[29]

针对严峻的四维复合全球治理赤字,中国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可以被统合视为新时代中国为全人类提供的优质国际公共产品。“三大倡议”密切联系,作为一个有机整体为突破全球治理困境、弥合全球治理赤字提供了中国方案。在“三大倡议”中,全球发展倡议回答了“如何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这一问题,提出应坚持发展优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普惠包容,坚持创新驱动,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行动导向;^[30]全球安全倡议回答了“如何实现各国共同安全”这一问题,提出应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坚持尊重各国主权、领土完整,坚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重视各国合理安全关切,坚持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的分歧和争端,坚持统筹维护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安全;^[31]全球文明倡议回答了“如何实现世界文明交流互鉴”这一问题,提出应共同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32]

“三大倡议”作为一个有机整体,不可分割,三者均兼备安全公共产品、生产公共产品、制度公共产品和知识公共产品的功能,能够有效弥合全球和平赤字、全球发展赤字、全球信任赤字和全球价值赤字,其治理逻辑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和融合性。

(一)统合“三大倡议”作为安全公共产品弥合全球和平赤字的逻辑

和平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也是一切发展进步的前提。^[33]当前,国际安全格局正经受冷战结束以来最严峻的挑战,安全公共产品供给乏力,和平赤字巨大。面对安全风险挑战与和平威胁潜因,“三大倡议”分别从物质、规则和沟通三个层面统合作为安全公共产品,协力弥合和平赤字(见图2)。

其一,全球发展倡议作为安全公共产品,能够从物质层面解决冲突产生的根源。资源有限性和人类需求无限性之间的矛盾贯穿历史脉络的始终,是各类冲突产生的一大根源,物质财富的匮乏与不均衡占有向来会引发安全困境,甚至摧毁和平。因而,发展是和平的前提,有发展才能有安全。全球发展倡议坚持发展为先和创新驱动,着力提高全球生产力水平,以行动导向推动全人类共同创造财富,同时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普惠包容地促进全球财富公平分配。生产力的大发展可以有效避免资源争夺、产业矛盾等因素引发的冲突,财富共享与公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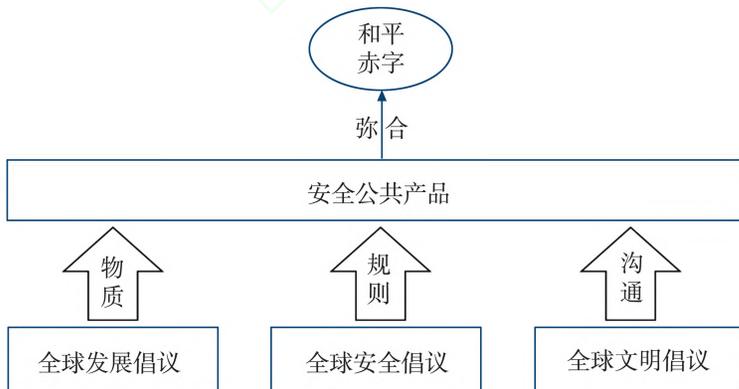


图2 统合“三大倡议”作为安全公共产品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分配模式也能够缩小各国之间以及各国内部的“发展鸿沟”和贫富差距,安抚国际社会和国内社会的不满、敌对情绪,釜底抽薪地解决、预防因物质匮乏与不均衡占有所带来的安全问题,弥合全球和平赤字。

其二,全球安全倡议作为安全公共产品,能够从规则层面增加破坏和平的成本。奉行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的国家不

顾规则限制、出于私利行事是和平的最直接威胁,也是安全问题产生的最直接原因。随着近年来世界体系加速变动、各类议题“泛安全化”趋势加重,世界落入“泛安全化陷阱”,^[34]国际上少数国家堂而皇之在“维护国家安全”的名义下行恃强凌弱之事,干扰国际合作、推行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政策,以求在各个领域护持其霸权,对全球多边主义秩序规则、国际合作、大国关系造成了严重冲击,使得全球范围内“不守规则”成为某种常态,破坏和平的成本越来越低。值此紧要关头,全球安全倡议明确提出应当坚持尊重各国主权、领土完整,坚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重视各国合理安全关切,坚持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的分歧和争端,这些对规则的坚持与维护,证明了全球安全倡议绝不是封闭排他的地缘政治工具,而是致力于实现各国共同安全、为解决安全困境提供可行思路和现实举措的安全公共产品,若能被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接受并践行,就能够在规则层面抬高少数国家出于私利破坏和平的成本,形塑起一个遵守规则的有序安全氛围,以弥合全球和平赤字。

其三,全球文明倡议作为安全公共产品,能够从沟通层面达成矛盾缓和的目的。沟通即在紧要关头能够进行对话。国家总是会倾向于高估对手的敌意,即高估对手的冲突能力和决心。^[35]因而,沟通不畅会使既有矛盾不断放大,进而增加发生冲突的风险,加强沟通是实现和平的长久之计。近年来,在“泛安全化”背景下,西方国家以意识形态划界,以“价值观”为名划分敌友,大搞所谓“价值观同盟”(Value-Based Alliance),只在“小圈子”里沟通,对其“小圈子”外的国家抱有防范心态与强烈敌意,各类官方沟通渠道逐渐瘫痪,各项民间交流活动也阻力重重,这种沟通障碍极易放大“错误知觉”(Misperception),形成战略误判,促成非理性决策,威胁世界和平。全球文明倡议致力于推动实现世界文明交流互鉴,提出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有利于各国之间加强沟通,尽量拆除西方建构起的“小圈子”壁垒,驱散危害和平的“信息迷雾”,超越“文明的冲突”,实现各个文明之间的相互包容与和平共处,在国际安全问题上求同存异,共同创造人类的和平未来,弥合全球和平赤字。

(二) 统合“三大倡议”作为生产公共产品弥合全球发展赤字的逻辑

提升发展质量、缩小发展鸿沟、实现共享繁荣,是全人类追求秩序、财富、公正和自由的基础。然而,当前全球发展赤字严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世界经济受到地缘博弈、逆全球化、美联储加息以及新冠疫情等因素影响,发展信心与动力不足,整体呈现疲软态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2023年的全球经济增长预计为2.9%,虽比联合国预测数值略高,但相较于2022年的3.4%下降了0.5%,2024年的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会上升到3.1%,却仍低于2000年至2019年期间3.8%的平均增长值。^[36]另一方面,南北国家之间的发展差异加大。《2022年世界不平等报告》显示,目前全球收入差距高居1929年世界经济大危机以来的最大值,发展中国家追赶发达国家的速度已经由2010年前的10%逐渐下降到了2015年后的1%,特别是新冠疫情暴发后,北方国家的经济反弹力度整体超过了南方国家,两者之间一度接近的经济总量再度被拉开。^[37]联合国《2022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也指出,在全球从疫情冲击恢复的过程中,发达国家的恢复速度明显快于发展中国家。^[38]虽然有史以来,人类社会总是处于持续的不平等状态中,^[39]但随着战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中心国家”对“边缘国家”的长期压榨,再加上“大变局时代”来临,南北国家发展鸿沟的裂痕越来越大,全球发展鸿沟的产生与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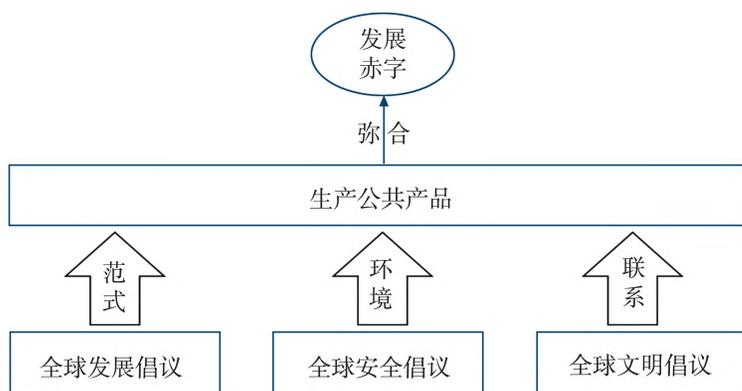


图3 统合“三大倡议”作为生产公共产品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其一，全球发展倡议作为生产公共产品，能够从范式层面指导全球发展的推进方向。“范式”(paradigm)即特定共同体成员有意识坚持的技术、模型和价值的集合或是集合中的某单一元素。^[40]面对发展态势疲软和发展鸿沟扩大，当前全球发展应该往何处去，世界各国莫衷一是，缺乏可以被广泛接受的范式，新型国家发展合作范式的特点虽然日渐显现，但挑战依然严峻。^[41]为了解决当前全球发展效率与公平兼缺的问题，世界呼吁能有一个纲领性的发展范式来作为生产公共产品，指引全球发展推进的方向。全球发展倡议是为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推动全球发展治理变革和构建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而提出的中国方案，直接指明了应当如何发展，其发展优先、人民中心、普惠包容、创新驱动、和谐共生、行动导向等要义，成功塑造起一个发展范式的基本框架，正面回应了人类现阶段所面临的基本发展难题。全球发展倡议作为优质生产公共产品，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实现人类可持续发展以及生产繁荣提供了关键范式指引，并给出了可行性路径，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同，能够有效弥合全球发展赤字。

其二，全球安全倡议作为生产公共产品，能够从环境层面形塑繁荣生产的和谐氛围。全球发展离不开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42]生产的开展有赖于和谐的氛围，大环境的和谐有利于消除各国发展疑虑，加速技术应用与生产力提高，实现产业链合作，促进国际贸易，增加各国绝对收益，最终实现普惠发展。今天的世界，各种经济活动都愈发笼罩在不和谐、不安定的地缘政治斗争氛围中，全球发展在少数国家的“泛安全化”话语与行为下面临重重阻碍，国际经济大环境不容乐观。此外，除了传统领域安全威胁，非传统领域安全问题也纷纷涌现，进一步放大了全球发展赤字。在此背景下，全球安全倡议所提出的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观以及坚持尊重各国主权、领土完整，坚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统筹维护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安全等要义，有利于形塑起和谐、稳定的国际发展氛围，给世界经济打上了一针“强心剂”。全球安全倡议作为一种生产公共产品，对于保障和平、避免战争、实现“三链”(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安全与稳定生产大有裨益，能够有效弥合全球发展赤字。

其三，全球文明倡议作为生产公共产品，能够从联系层面规避要素流动的阻断风险。联系即加强各方之间的各类往来。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是当代世界经济的本质特征，^[43]无论是

大，既有发展中国家内部在发展战略选择、内部国家治理等方面自身的问题，但更是由西方国家所提供的生产公共产品不公正、不合理所造成。面对这一效率与公平兼缺的情况，“三大倡议”统合作为优质生产公共产品，分别从范式、环境和联系三个层面成为了促进全球生产和弥合发展赤字的重要纲领(见图3)。

商品要素、资源要素、劳动力要素还是技术要素,其国际流动都是全球发展与生产力提升的关键环节,而交流是促进要素流动的重要抓手。近年来,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各国开始深陷猜疑、恐惧、孤立等消极情绪中,联系越来越少,贸易战、科技战、认知战此起彼伏,全球贸易体制瘫痪,产业链分工断裂,人员交流不畅,技术与共享更是被严防死守,生产要素流通的阻断风险不断上升。在此背景下,全球文明倡议提出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对于重建各国各领域联系、消除互相防范心理、保障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能够有效弥合全球发展赤字。

(三) 统合“三大倡议”作为制度公共产品弥合全球信任赤字的逻辑

国际制度即事关国际体系、体系中的行为体(包括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以及它们的行为的一系列相对稳定、相互联系的构成性、规制性和程序性的规范和规则。^[44]国际制度能够带来确定性,是无政府状态下各国际行为体达成相互信任的保障。然而,当前国际制度已然进入变革期,由于西方主导的国际制度日益失灵,制度公共产品供给乏力,规则的缺失给人类社会各个领域带来严重的不确定性,进而催生了巨大的信任赤字。各国都需要在世界变局中重新确立自己的定位,由此而来的围绕国际规则及制度安排的博弈也必然趋于激烈。新的制度公共产品只有具备更大的包容性和必要的公正性,才能引导世界走向相互信任,因而国际社会需要对现有制度不合理、不充分的内容进行有效的改革。长期以来,美国及西方国家将其提供的制度公共产品当作维护霸权与优势的工具,拒绝根据国际体系结构的变化进行制度更新,不断搞“小圈子”,现有国际制度权威性被不断削弱,全球信任赤字越来越大。在此背景下,国际政治制度的更新与重建颇为困难,但中国的“三大倡议”统合作为制度公共产品,能够分别从经济、军事和文化三个层面进行新制度建构的引领,随着日后细化落实到规则层面,将对于提供公正的新制度、消解全球不信任坚冰、弥合信任赤字大有裨益(见图4)。

其一,全球发展倡议作为制度公共产品,能够从经济层面推动新全球经济发展规则的制定。近年来,逆全球化潮流冲击世界,大国地缘政治博弈日益激烈,国际社会的各种既有规则、机制都趋于崩坏,在经济领域,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加之新冠疫情席卷全球,世界经济规则体系正常运行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比如曾经作为跨国经济活动的机制基石、全球多边贸易体制的依托——世界贸易组织(WTO)已经处于一种事实上接近瘫痪的状态。与此同时,数字产业地位凸显带来了产业链生态变化,因为数字产业并不像传统产业一样,在世界市场中存在一条长产业链可以容纳较多大国进行上中下游互补链合,^[45]这就使得原有的制度公共产品供给显得十分滞后,无法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难以消弭数字大国之间的不信任与零和竞争,甚至作为传统盟友的美欧在数字经济上都互不信任、摩擦频发,旧有制度的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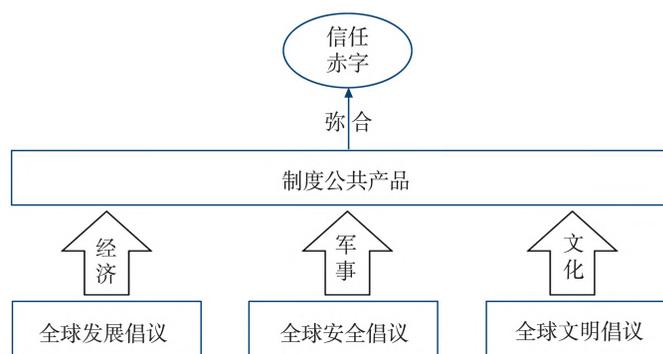


图4 统合“三大倡议”作为制度公共产品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则急需更新。当此紧要关头,全球发展倡议提出应坚持创新驱动、坚持行动导向,为改善滞后与失灵的旧经济制度及其衍生的发展信任缺失、建构更合时宜的新全球经济发展规则、在经济层面弥合全球信任赤字大有裨益。

其二,全球安全倡议作为制度公共产品,能够从军事层面推动新全球安全管控制度建构。没有切实的安全管控,国与国之间就难有基本的信任,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军事博弈“猫鼠游戏”一旦脱离了游戏规则就极可能带来严重的连锁反应,^[46]人类历史上存在过五种较为成熟的军事安全管控制度公共产品供给,即朝贡安全制度、均势安全制度、“治下”安全制度、联盟安全制度和集体安全制度。其中,朝贡安全制度早已随着中国近代衰落与东亚秩序重组而断绝,均势安全制度则更多表现为一种客观现实或习惯,而非精细化规则建构。目前,“治下”安全制度、集体安全制度和自称“集体安全制度”的联盟安全制度彼此交织存在。“治下”安全制度即“罗马治下的和平”(Pax Romana)、“不列颠治下的和平”(Pax Britannica)、“美利坚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等,其本质上是霸权强制推行的安全制度,天然带有不义的性质,目前随着美国霸权的衰落,“美利坚治下的和平”引发了越来越多的不满,且美国提供这种制度公共产品的能力和意愿也在下降。集体安全制度则是联合国所提倡的安全制度,该制度强调国家放弃武力改变现状,反对大国根据自我利益行事,赞成国家之间相互信任。然而,在无政府状态下,集体安全的理想化安排既无成功先例,亦无有力保证,同时由于北约(NATO)等联盟安全制度主体宣称自己是集体安全制度的实践者,随着其践踏和平行为的增多,集体安全制度这一概念的公信力也不断下降。旧有军事安全管控制度及其规则的失灵,进一步导致了各种依附于制度与规则的安全协调和军备控制机制逐渐瘫痪,放大了各国的猜疑与不信任感,全球信任赤字不断扩大。值此关头,全球安全倡议提出“六个坚持”,倡导共同安全,即一方面任何一国不能牺牲他国的安全来谋求本国的绝对安全,另一方面全球安全议题应该全球携起手来共同应对,而非以一己之私把责任推给他国,这一制度构想能够突破旧的军事安全管控制度及其规则,在未来引领建构一套真正有利于相互信任、长久和平、规避军事冲突的可行制度,弥合全球信任赤字。

其三,全球文明倡议作为制度公共产品,能够从文化层面推动新全球文明交流机制形塑。相比于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的制度及其规则,文化领域的制度公共产品本就比较少,且随着近年全球猜忌氛围浓厚,供给愈发不足,要化解人类所面临的突出信任矛盾问题,既需要依靠硬性规则的明确保障,也需要依靠交流机制的诚意正心。文明交流机制往往能起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对于增加确定性、化解全球信任赤字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今天世界各地“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频发,不同国家、不同文明急需携手应对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各种全球性挑战,但个别国家以意识形态划界、大搞阵营对抗的冷战思维以及以“价值观”为名划分敌友、拉帮结派的做法,给整个世界和平与发展、繁荣与进步带来巨大阴影。^[47]在这种背景下,既有的文化交流机制纷纷中断,尤其是中美之间的人文交流机制遭遇重大挫折,而全球文明倡议提出应共同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为形塑更为丰富、具体和生动的人文交流机制提供了指导,有利于在文化层面消除信任坚冰,弥合全球信任赤字。

(四) 统合“三大倡议”作为知识公共产品弥合全球价值赤字的逻辑

一个和平发展的世界离不开不同文明的相互启发和借鉴,人类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也没有既定的“金科玉律”。^[48]然而,当今西方宣扬自己的价值观是“普世价值”,人类文明已经在“普世价值”的指引下走向了“历史的终结”,以自己的价

值为标尺划分小圈子,强行区别“我者”和“他者”,并利用自己口径下的“自由民主”等价值概念在世界各地制造混乱,扩大了本就严重的全球价值赤字,各种思潮不断涌动,各国对于共同价值莫衷一是,世界欠缺能够弥合价值赤字的知识公共产品。中国提出的“三大倡议”根植于中华文化,热爱和平的传统催生了全球安全倡议,求真务实的传统催生了全球发展倡议,求同存异的传统催生了全球文明倡议,“三大倡议”都蕴含着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当前人类文明面临极大挑战,面对这一情况,“三大倡议”分别从存在、存续和思维三个层面统合作为知识公共产品,为人类文明的未来谋福祉,提供了优质的解决方案,共同弥合价值赤字(见图5)。

其一,全球发展倡议作为知识公共产品,能够从存在层面引领人类正确获取物质财富。存在即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实在,注重现世。西方获取物质财富和现世幸福,在早期是通过殖民掠夺,直接抢走其他国家的物质资料,积累了原始资本,而后是通过制度性的体系压榨,在“中心—边缘”体系中源源不断地获取财富,^[49]存在先天的不义性,且其发展路径与解释模式并不符合大多数国家的现实存在情况,作为知识公共产品难以也不应被复制。这种存在层面获取物质财富的价值取向,多年来使得列国出于物欲目的伐交频频,尤其是在全球生产力发展放缓的近些年,无道德束缚争抢财富的价值取向引发诸多混乱,带来了严重的价值赤字。中华文化向来有现世主义倾向,在重视现世存在、自强不息的基础上,也坚持厚德载物,对物质财富“取之有道”,同时宣扬“不违农时”“数罟不入洿池”“斧斤以时入山林”等环保发展思想。根植于中华文化的全球发展倡议,其五个“坚持”作为知识公共产品,在存在层面为人类如何正确获取物质财富、实现现世幸福提供了价值引领,有利于弥合全球价值赤字。

其二,全球安全倡议作为知识公共产品,能够从存续层面解答人类何以达成和平延续。存续即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实在的延续,注重未来。西方的存续价值取向具有“求一”的特征,其来源于柏拉图思想与基督教理论的结合,即以“一元”为核心的世界主义与旷世的“帝国”理想。^[50]和平是人类存续的必要条件,但西方知识公共产品对和平的理解至今仍是单一强权主导下的和平。“一元论”历来深刻影响着西方战争史,西方国家经常会利用价值观来划分阵营,将价值“武器化”“安全化”,例如美国进行的对外战争或军事试探,基本都是打着推行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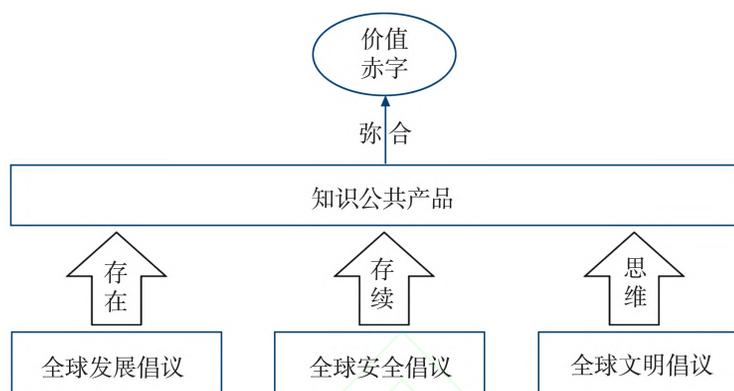


图5 统合“三大倡议”作为知识公共产品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一元价值的旗号进行的,这种陈旧的知识公共产品严重威胁到人类文明的延续,全球治理的价值赤字正在不断增大。与西方的知识公共产品不同,中华文化具有和平主义的传统,^[51]认为世界的本原不是“一”而是“多”,世界不是从一个本原衍生而来的,而是由多个元素和合共生而成的,所以不需要用非和平的手段去消灭“多”,达成“一”。基于此,全球安全倡议提出的六个“坚持”作为知识公共产品,在存续层面正面解答了人类应如何达成和平延续,有利于弥合全球价值赤字。

其三,全球文明倡议作为知识公共产品,能够从思维层面探求人类如何实现求同存异。赫德利·布尔(Hudley Bull)认为,国际关系研究需依赖人类不言自明的天赋理性。^[52]理性并不完全是天赋的,也深受人类自身文化的影响,与人类文化存在互动关系,人类各大文明均有深受自身文化熏陶的理性思维,每种文明都有独特且珍贵的价值取向,为人类贡献着各种知识公共产品。当今人类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各国深陷零和思维的桎梏,合作变得越来越弥足珍贵,甚至良性竞争都正逐步滑向恶性竞争,世界呼唤具有求同存异价值取向的知识公共产品。中华文明向来强调“美美与共”“多元和合”“和谐共生”,包容是中华文明的底色,也是中国五千年文明从未断绝的根源所在,在这个迷茫彷徨的变局时代弥足珍贵,立足于中华文明的全球文明倡议所提出的四个“共同倡导”,无一不体现着这种求同存异的包容思维,若能够被理解践行,必将很大程度弥合全球价值赤字,世界文明百花园将更加璀璨。

三、中国“三大倡议”的治理实践路径

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的提出,在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的紧要关头,作为一个有机整体为全球治理提供了优质的国际公共产品,为人类的前进指明了方向,但若突破多重全球治理困境、弥合复合全球治理赤字,还需要将“三大倡议”的要义落到实处,或可从以下五个方面推进倡议实践,助力全球治理,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第一,形塑学理逻辑,建构知识体系。将“三大倡议”进一步学理化,不仅是在理论层面建构我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关键一着,更是未来在实践层面强化“三大倡议”地位与作用的必由之路。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三者不是割裂开来的,而是相互联系、三位一体的有机整体,三者互为前提与补充。形塑学理逻辑,建构知识体系可以从三方面着手:其一,动员学界在学理上从各种视角进一步理顺“三大倡议”的内在联系,统合而非割裂地探讨其治理逻辑及实践路径,将其归置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之下,系统化、规范化地阐释出来,形成成熟的理论;其二,动员学界加强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研究,用实证的方法和充足的证据验证理论的可行性,同时加强理论对实践的指导;其三,动员学界保持学术敏锐,随着实践的推进,与时俱进补充进新的内容、要义。只有拥有完善的自主知识体系、科学的学理逻辑,才能掌握话语权,破除污名化,用以高效指导实践,达成良好治理效果。

第二,加强国际推广,讲好中国故事。“三大倡议”是优质国际公共产品,但必须要在国际上被广泛承认、接受、使用,才能真正发力作用于整个国际社会,故而必须加强国际推广,讲好中国故事。对“三大倡议”的国际推广可以从三方面着手:其一是要加强国际传播。通过各种渠道,从官方外交到公共外交,有规划地动员各界向世界宣传“三大倡议”的治理逻辑与积极

意义,将中国倡议融入中国故事,生动形象地向世界讲述,在这一过程中要注意使用数字时代的新媒体、新技术;其二是要加强议程推动。倡议的真正扩散有赖于制度和机制的支撑,随着中国实力的不断增长,目前的国际话语权、议程制定权已经有所提高,可考虑在各类国际机制与议程制定中嵌入“三大倡议”的相关内容,争取将要义落实到正式的规则中去;其三是要加强实践示范。一行胜万言,应当多多在“三大倡议”要义的指导下进行实践示范,彰显“三大倡议”的实际效果,增强说服力,此前中国推动沙特和伊朗的和解,就是对“三大倡议”的生动实践诠释。

第三,落实配套措施,持续优化细化。“三大倡议”作为引导纲领,只有不断机制化、系统化、落实化,辅之以完备的配套措施,才能够真正作为国际公共产品发挥作用,否则就容易被他人故意曲解,比如当前国际舆论对于全球安全倡议的分析已经从评估中国提出倡议的意图转向批判性地评估中国将倡议付诸行动的能力。^[53]为达到这一目标,可以从三方面着手:其一,加快配套措施落实。当前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发展倡议已经有了一系列的配套措施与规则,并且被多方广泛接受,开始切实发挥治理作用,但还是不够细化,需要进一步延展各类配套措施的边界,争取囊括安全、发展的更多议题,同时,最新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也应加快制定配套措施与规则,推进细化;其二,在实践中与时俱进。“三大倡议”在细化的同时,也应在实践检验中不断持续优化,广泛征求意见,倾听不同国家、不同群体的声音,根据实践反馈查漏补缺,使得具体措施更贴合时代的需求、人类的前景;其三,进行既有制度和机制改革。需要用“三大倡议”内涵、要义赋予既有制度和机制新的生命与活力,更新其滞后、无用的相关内容,使这些陈旧的公共产品能够重新适应时代的发展、满足变局的需求。

第四,各界广泛参与,多元共同推动。“三大倡议”不应只由政府推动,应发动包括私营部门、技术社群、公民社会等多元主体广泛参与,共同实践“三大倡议”内涵与要义。协力推动“三大倡议”的实践创新,将实践融入方方面面,这是一个不断探索、尝试、成长和演进的过程。为达到这一目标,政府部门应当统筹领导,确定实践的相关原则,营造多元主体参与践行“三大倡议”的良好环境,并给予必要的指导和帮助;私营部门需要在其商业经营活动中遵守相关规则,主动承担起在发展、安全和文明治理中的责任,践行普惠包容、创新驱动、人与自然和谐、统筹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等相关要义;技术社群应推动技术的发展与应用,管控技术的风险和挑战,积极进行技术、人员交流;公民社会则应当从个体层面践行“三大倡议”,倡导共同发展、维护国家安全、弘扬共同价值、推进人文交流。

第五,团结世界共进,达臻全球善治。“三大倡议”不是独属于中国的倡议,而是服务于全人类的国际公共产品,“三大倡议”的内容和目标无一不彰显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因而若要真正践行,需促成世界团结,全球携手共进,才能达臻善治。为达到这一目标,中国可以从三个方面努力:其一,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长久以来受到发展鸿沟、安全困境和文明冲突的困扰,旧有国际公共产品并不能解决其难题,中国所提供的公共产品为发展中国家走出困境、解决难题给出了有借鉴意义的方案,中国需要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紧密团结在一起,加强各领域联合,共同弥合全球治理赤字,革新不义国际秩序,共建平等公正未来;其二,加强与美国以外发达国家的沟通。这些发达国家是旧国际公共产品的协助提

供者和受益者,依然保有一定的供给能力、意愿和影响力,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乏力会损害其利益,且发达国家内部对美国利用霸权将公共产品“私物化”的不满也日益增加,中国需要与各发达国家加强沟通,促进其理解、接受“三大倡议”的内涵,寻求合力供给国际公共产品的可行方案;其三,加强与美国的协调。即便存在供给能力下降与意愿退缩、“私物化”行为愈发明目张胆等负面情况,美国依然是“超级大国”和国际公共产品的主要提供者,当前美国对中国充满警惕,在各个领域都强调对华竞争,而公共产品供给事关秩序、财富、公正、自由等多个维度的价值,“三大倡议”要想顺利推广并发挥作用,离不开与美国的必要协调。中国需要与美国加强协调,规避恶性竞争,正如习近平主席所指出的,中美双方需要“探讨新时期两国正确相处之道,找到两国关系发展的正确方向,推动中美关系重回健康稳定发展轨道,造福两国,惠及世界”。^[54]当此紧要关头,美国需要明白不能为了一己私利将突破多重全球治理困境、弥合复合全球治理赤字的全人类共同努力“地缘政治化”“意识形态化”和“泛安全化”,世界必须团结共进,才能应对“大变局”时代的来临。

四、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何去何从取决于各国人民的选择”。尽管人类面临严峻挑战,但我们还是要看到,“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历史潮流不可阻挡,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决定了人类前途终归光明”。^[55]

今天人类正面临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乏力带来了多重全球治理困境,进而扩大了复合全球治理赤字。中国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可以被统合视为新时代中国为全人类提供的优质公共产品。“三大倡议”密切联系、不可分割,均兼具安全、生产、制度、知识公共产品的功能,作为一个有机整体能够突破全球治理的地缘冲突困境、发展失衡困境、体系失灵困境和价值混乱困境,进而弥合全球治理的和平赤字、发展赤字、信任赤字和价值赤字。但若要真正发挥作用,中国还需要形塑学理逻辑,建构知识体系;加强国际推广,讲好中国故事;落实配套措施,持续优化细化;各界广泛参与,多元共同推动;团结世界共进,达臻全球善治,将“三大倡议”落到实处,着力塑造人类繁荣、和平、昌明的新未来。

如果能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顺应时代潮流,统合落实好“三大倡议”,进行优质公共产品供给,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人类前途必然终归光明。

参考文献

- [1]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习近平提出全球文明倡议[EB/OL]. http://www.gov.cn/xinwen/2023-03/15/content_5746927.htm, 2023-05-07.
- [2]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习近平提出全球发展倡议[EB/OL]. http://www.gov.cn/xinwen/2021-09/22/content_5638602.htm, 2023-05-07.
- [3]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习近平提出全球安全倡议[EB/OL]. http://www.gov.cn/xinwen/2022-04/21/content_5686416.htm, 2023-05-07.

- [4] 樊勇明.从国际公共产品到区域性公共产品—区域合作理论的新增长点[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1):144.
- [5] Paul A. Samuelson.The Pure Theory of Public Expenditure[J].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Vol.36, No.4, 1954: 387-389.
- [6] 黄恒学.公共经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48-50.
- [7] 张雪滢.国际公共产品与中国构建国际机制的战略选择[J].复旦国际关系评论,2018(1):253-268.
- [8] 黄河.公共产品视角下的“一带一路”[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6):138-155.
- [9] Sandler Todd.Public Goods and Regional Cooperation for Development: A New Look[J].Integration and Trade, Vol.17, 2013: 13-24.
- [10] 马斌,王润琦.“一带一路”倡议与欧亚地区区域性公共产品供给体系重构[J].复旦国际关系评论,2018(1):238-252.
- [11] Charles P. Kindleberger.The World in Depression 1929-1939[M].London: The Penguin Press, 1973: 305.
- [12] Joseph S. Nye. The Kindleberger Trap [EB/OL].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trump-china-kindleberger-trap-by-joseph-s-nye-2017-01?barrier=accesspaylog>, 2022-11-28.
- [13] 张建新,施嘉恒.金德尔伯格陷阱:历史与现实的比较[J].复旦国际关系评论,2019(1):48-64.
- [14] 蔡翠红,于大皓.美国“印太战略”背景下的中国与东盟数字经济合作及其挑战[J].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2):26-39.
- [15] 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M].陈郁,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64.
- [16] 黄河,何家萱,纪昊楠.中国与世界贸易组织改革:国际公共产品的视角[J].复旦国际关系评论,2020(1):19-37.
- [17] 苏珊·斯特兰奇.国家与市场(第二版)[M].杨宇光,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47.
- [18] 李志斐.东亚安全机制构建——国际公共产品提供与地区合作[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27.
- [19] 程铭,刘雪莲.共生安全:国际安全公共产品供给的新理念[J].东北亚论坛,2020(2):71-83.
- [20] 苏长和.全球安全架构设计的理论思考[J].国家安全研究,2022(5):20-32.
- [21] Benjamin Miller. The Concept of Security: Should It be Redefined? [J].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Vol.24, No.2, 2001: 13-42.
- [22] 凌胜利,王秋怡.全球安全倡议与全球安全治理的中国角色[J].外交评论,2023(2):1-21.
- [23] 侯冠华.习近平全球发展倡议的多维论析[J].理论探索,2023(2):79-86.
- [24] United Nations. World Economic Situation and Prospects 2023 [EB/OL]. January 25, 2023, <https://www.un.org/development/desa/dpad/publication/world-economic-situation-and-prospects-2023/>, 2023-05-11.
- [25] 李巍.国际秩序转型与现实制度主义理论的生成[J].外交评论,2016(1):31-59.
- [26] 张建新,董雅娜.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终结[J].国际观察,2022(6):23-53.
- [27] 吴志成,李佳轩.全球信任赤字治理的中国视角[J].政治学研究,2020(6):24-36.
- [28]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中央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19-420.
- [29] 吴志成,李金潼.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中国视角与实践[J].政治学研究,2014(5):111-124.
- [30] 习近平.坚定信心,共克时艰共建更加美好的世界——在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的讲话 [EB/OL].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 http://www.gov.cn/xinwen/2021-09/22/content_5638597.htm, 2023-05-11.
- [31] 习近平.携手迎接挑战,合作开创未来——在博鳌亚洲论坛2022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EB/OL].

- http://www.gov.cn/xinwen/2022-04/21/content_5686424.htm, 2023-05-09.
- [32] 习近平. 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EB/OL]. http://www.gov.cn/xinwen/2023-03/15/content_5746950.htm, 2023-05-09.
- [33] 吴志成, 李佳轩. 全球和平赤字治理与中国的责任担当[J]. 国家安全研究, 2022(1): 137-164.
- [34] 张超, 吴白乙. “泛安全化陷阱”及其跨越[J]. 国际展望, 2022(2): 19-35.
- [35] Robert Jervis. *How Statesmen Think: The Psycholog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7: 191-215.
- [36]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orld Economic Outlook* [EB/OL]. January 31, 2023, <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WEO/Issues/2023/01/31/world-economic-outlook-update-january-2023>, 2023-05-10.
- [37] World Inequality Lab. *World Inequality Report 2022* [EB/OL]. December 7, 2021, <https://wir2022.wid.world/>, 2023-05-10.
- [38] United Nations. *World Economic Situation and Prospects 2022* [EB/OL]. January 13, 2022, <https://www.un.org/development/desa/dpad/publication/world-economic-situation-and-prospects-2022/>, 2023-04-29.
- [39] 沃尔特·沙伊德尔. 不平等社会: 从石器时代到21世纪, 人类如何应对不平等[M]. 颜鹏飞, 等, 译. 中信出版集团, 2019: 1-17.
- [40] Thomas Samuel Kuhn.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2: 68-74.
- [41] 郑宇. 新型国际发展合作范式的初现与挑战[J]. 中国社会科学评价, 2021(2): 104-117.
- [42] 习近平. 共迎时代挑战 共建美好未来——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七次峰会第一阶段会议上的讲话[EB/OL]. http://www.gov.cn/xinwen/2022-11/15/content_5727057.htm, 2023-05-08.
- [43] 马飒. 生产要素国际流动: 规律、动因与影响[J]. 世界经济研究, 2014(1): 3-9.
- [44] John Duffield. *What Ar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J].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9, No.1, 2007: 1-22.
- [45] 于大皓. 基于区位熵分析法的油气产业依赖度与国际合作[J]. 国际石油经济, 2021(11): 75-82.
- [46] 胡欣. 刀尖上的“游戏”: 美俄(苏)军事风险管控的启示[J]. 世界知识, 2018(20): 17-19.
- [47] 邢丽菊. 全球文明倡议引领人类和平发展[J]. 当代世界, 2023(4): 48-53.
- [48] 孙敬鑫. 全球文明倡议对外话语体系建设及实践路径[J]. 当代世界, 2023(4): 42-47.
- [49]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 [M]. 郭方, 等, 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 7-14.
- [50] 伯特兰·罗素. *西方哲学史(上卷)* [M]. 何兆武, 等,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6: 407.
- [51] 吴晓明. 论中国的和平主义发展道路及其世界历史意义[J]. 中国社会科学, 2009(5): 46-59.
- [52] Hedley Bull. *International Theory: The Case for a Classical Approach* [J]. *World Politics*, Vol.18, No.3, 1966: 361-377.
- [53] 王明国. 国际社会对全球安全倡议的多重认知与中国的推进策略[J]. 国际安全研究, 2023(3): 28-52.
- [54]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拜登在巴厘岛举行会晤[N]. 人民日报, 2022-11-15(1).
- [55]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EB/OL]. https://www.gov.cn/xinwen/2022-10/25/content_5721685.htm, 2023-05-10.

[责任编辑 孟祥臣]